

#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革命实现途径的探索 ——以安源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陆华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 安源工人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工人革命。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中共革命实践不同,它持续的时间长、斗争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共早期革命从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到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中心的革命范式的转移,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宝贵的“活化石”。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重要,它的历史证明了中共早期对革命实现方式的探索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逐渐结合,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关键词:** 安源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 革命实现方式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1)04-0070-07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对于如何在中国实现革命的胜利,对于当时党的领导人来说,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正如一大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回答包惠僧所提的“中国的革命如何革法”的问题时所说的“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sup>[1]237</sup>。后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陈独秀的以上观点。在中共成立以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道路并非直线型的发展之路,而是先后历经了从最初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到后来的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大革命,再到后来单独发动武装起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最终使中共的革命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政策。关于中共早期对革命方式的探索历程,以往的学界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探索,但多采取宏大宽泛的视角从理论上追寻了这一过程的内在理路,缺乏对这一系列艰难转型背后的多重因素的综合,因而缺乏“生、活”特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早年对革命方式的探索过程,与我们今天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样,也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试错反弹”过程,这一过程的产生基础既有中共自身的主观选择,也有现实的客观环境的制约,是一个非直线型的曲折过程。本文以安源工

人运动这一中共早年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个案研究,以管窥中共成立初期对革命道路选择的艰难历程及深刻缘由。

## 一、安源工人运动的独特性质 及对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宝贵价值

### (一) 安源工人运动的独特性质

#### 1. 持续的时间长,前后长达十年之久

它的兴起源自中共建立伊始的1921年秋季。在中共成立以后,党把领导发动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在一大上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了“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sup>[2]5</sup>,而对其他问题均无暇顾及,“使农民与军队问题都成了悬案”<sup>[3]248</sup>。同时规定把组织工会与教育工人是当时党的工作重点。一大闭幕后,作为大会代表之一的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并担任了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着手发动工人运动,这时他把发动工人运动的重点放在了安源地区(当时安源尽管行政上隶属江西,但在经济文化与地理位置上与湖南关系更密切,加之当时中共在江

收稿日期:2011-06-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70040);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A.15-A.011-09-001)

作者简介:陆华东(1972-),男,安徽定远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

西力量薄弱,因而在党组织关系上中共湖南支部在安源影响更大)。他从1921年秋天开始,多次来到安源,下煤矿,深入工人家庭,与工人谈心交朋友,为安源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又先后派遣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来到安源,相继创立了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于1922年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并于同年9月13日到9月18日,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安源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用120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的胜利。”<sup>[4]18</sup>

在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以后,安源工人运动经历了从1922年9月到1925年9月的近三年的和平斗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下,安源地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立了中共工人运动的一座丰碑。特别是在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不利局面下,安源工人由于执行了党的“弯弓待发”的正确政策,不但没有受到反动势力的摧残,还进一步壮大了实力,不但工人俱乐部在全国“硕果仅存”,而且工人地位极大提高。但在1925年9月21日凌晨3时安源工人俱乐部被汉冶萍公司勾结湘赣两省军阀所镇压,他们趁工人正处于交接班之际,派军队迅速占领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及干事九人,当工人欲反抗时,遭到了军警的屠杀,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他们还抢劫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学校、俱乐部,工人方面损失惨重,“损失财产约共五十余万”<sup>[5]597</sup>。不久他们不但残酷杀害了工人领袖黄静源,而且还悍然宣布对萍矿进行整顿,“开除工人一千二百多人,即以兵士押送出境,其中有家室尚在安源者,有无家可归者。其未开除之工人,悉行停工,失业者达万余左右”<sup>[5]537</sup>,而留在矿内继续上班的工人,“所余不过八百,而且多是职员私人”<sup>[5]545</sup>,这就是中外震惊的安源九月惨案,它的发生标志着长达三年之久的安源地方的合作局面被打破,从此以后,安源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1925年九月惨案以后,大批遣返回湘赣两省农村的安源工人开始与农民一道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他们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与秋收起义,直至30年代初期还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开创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可见,安源工人运动一波三折,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成为中共地方革命的一个实践楷模。

## 2. 斗争的阶段性特征明显

在安源工人运动近十年的斗争过程中,以1925年九月惨案为分界线,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即前期的和平的工会斗争阶段与后期的工农武装阶段。

第一阶段:和平的工会斗争时期(1922年9月至1925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后,中共安源党、团组织以工人俱乐部为中心,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倡导和平斗争。

一是加强工人队伍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安源工人俱乐部是当时安源工人的组织灵魂,在1922年9月罢工前已达近700人,罢工胜利以后,俱乐部威信大增,几乎12000名安源工人都加入了俱乐部。罢工胜利以后,安源工人俱乐部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首先,在功能上逐渐完善。为达到“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抗资产阶级作战机关营垒,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sup>[5]139</sup>的工会组织意义,俱乐部相继创办了教育、互济、会计、文书、庶务、讲演、游艺、交际等八股(后改为委员会)及裁判委员会、经济审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人消费合作社等机构,涵盖了教育、宣传、司法、治安、社会保障、民事纠纷等诸多社会职能。它既是工人的自治机关,也是一个半政权机关,“(工人)什么事情都找工会,司法官、矿警局没用处,工人有纠察队,打架就找工会,合作社有很多铺子”<sup>[6]900</sup>,俱乐部功能的完善使工人的各项事业均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其次,在组织上更加健全。它以俄国工会组织为蓝本,“以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采用民主的集权制”<sup>[5]139</sup>为组织原则,以十代表会、百代表会、最高代表会三级代表会议(后取消了百代表会议,以全体十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为决策机关,以各委员会与各股处为执行机关,形成了完善的俱乐部的组织体系。再次,俱乐部的纪律性加强,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俱乐部成立各种组织,加强对工人的保护与约束,处理工人内外部纠纷。工人将俱乐部视为军营,工人行动如军人,他们对俱乐部也充满了感情,他们说“谁要破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俱乐部

是我们的命,没有俱乐部我们就不能生活,不被打死就会饿死”<sup>[6]986</sup>。在经费保障方面,俱乐部的固定经费来源有工人的入部费与常月费(“部员入部时,须纳所得工资之一天为入部费。每月须计所得工资每洋一元纳铜元一枚”<sup>[5]205</sup>)及路矿两局每月津贴费(按 1922 年 9 月罢工协定,每月为 200 元)。在 9 月罢工胜利后,工人将所得加薪的一半计两万五千余元上交俱乐部使用,使俱乐部物质基础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资本数至 1924 年 12 月达洋 28 398 元<sup>[5]386</sup>,以上这些都使安源工人俱乐部财力得到了保障。

二是不断改善工人的社会地位。安源工人俱乐部将维护工人权益当做根本目的,大力维护自身切身利益,如 1922 年 9 月罢工时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的 13 条罢工条件,工人工资收入与人格尊严得到了极大改善。10 月安源工人又一举打破了包工制度,实行了合作制,“工头的工资每月自 10 元到 30 元,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 15%,管班占 5%,其余 80%,由工人平分”<sup>[4]21</sup>,工人第一次除了合理的工资以外,还拿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企业红利。在 1923 年 7 月,俱乐部又与矿局签订第二次协定,工人工资又有所提高,同时规定,“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sup>[4]24</sup>。伴随着俱乐部在各方面的长足发展,安源的工人也摆脱了以往低人一等的卑微身份,工人的自豪感与身份地位都得到了加强,“工人是工作、生活的大改善,地位大为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sup>[7]690</sup>。

三是对路矿当局采取了有理有节的合法斗争。从罢工之始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到革命低潮时期的“弯弓待发”的策略,安源工人运动在九月惨案之前,基本采取了和平的斗争手段。安源工人以工人俱乐部为武器,极力维护自身切身利益,工人地位不断提高,俱乐部当时也以合情合法斗争为前提,力倡劳资合作。俱乐部方面在要求矿局方面改善工人待遇的同时,还采取措施,约束工人,不得随意罢工、怠工,保证煤矿的日产量。在 1924 年矿局出现经济苦难之际,刘少奇还出于真诚之意,相继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两篇文章,为企

业当局出谋划策,同时要求工人顾全大局,与企业共渡难关。1924 年 6 月,俱乐部还成立了“出产整理委员会”,加强对工人的生产的监督管理,确保产业的发展。

四是建立了与地方当局的协调机制,安源地区社会呈现安定局面。俱乐部的壮大,使工人成为安源地方政治力量的重要一极,但他们没有动辄以暴力相威胁,而是与地方各种势力进行沟通合作,力促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与矿局密切合作,力保产业发展,甚至在 1924 年底在矿局出现经济困难拖欠工人数月工资导致工人生活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以保护产业,维护社会,及在此全力对外之时为理由,苦口劝导,幸免暴动。对于出产,犹忍饥耐饿维持原额,少时亦能出产 3/4 以上”<sup>[6]1198</sup>,甚至还有矿局与俱乐部共同将所存煤炭运至长沙销售以解决困难,上演了一幕劳资合作的感人景象。同时他们还与安源商会、驻军、县署共同协商企业大计,维持地方治安,这在当时的矿长李寿铨的《药石轩日记》里多次留下了记载。正是由于各方的协商合作,使安源地区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局面。

第二阶段:工农武装起义阶段(1925 年 9 月至 1930 年初)。自从安源九月惨案发生后,安源工人运动开始进入武装革命阶段,实现了斗争战略的转型。

首先,是掀起了湘赣两省的农民运动。在安源工人运动的和平合作机制被资方破坏以后,安源的工人陷入了极度困苦的悲惨局面,他们在被遣送回原籍以后,迅速与赣西、湘东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掀起了两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当时“湖南全省各县之农民运动,其主持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的安源路矿工人。湖南农民运动,在两个月之期间,已有高速度的发展(已有组织者 29 县,人数二十余万人)”<sup>[5]574</sup>。

其次,安源工人还积极投身于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俱乐部被封闭后,大批安源工人南下广东,投身革命,“到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到醴陵作战为止,先后参加革命军的安源工人不下 1000 人”<sup>[8]708</sup>,安源工人还是叶挺独立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伐军进入安源前后,安源工人大力支持配合北伐军,“使北伐军尚未抵达萍乡,一夜之间军阀即闻风而逃,北伐军则不战而进驻萍乡”<sup>[6]1028</sup>,为安源地区的国民

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最后,安源工人还积极投身中共的秋收起义,支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大革命初期的安源地方社会曾经出现过一度的良好局面,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安源工人俱乐部重新恢复,工人人数开始增加,工人地位有所改善,但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马日事变以后,安源工人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并于1927年9月,以安源纠察队与矿警队及附近农民为骨干,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后改为第二团,全团约2000人<sup>[5]23</sup>),积极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表现极其勇敢,如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所说“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确是革命的先锋队”<sup>[9]</sup>。在秋收起义受挫以后,大批安源工人还追随毛泽东走上井冈山根据地(约为数千名),同时安源工人还为井冈山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组织等方面的支持。伴随着安源工人运动的转型,安源地区也成为中国武装革命的重要中心之一。

(二) 安源工人运动对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宝贵价值

与其他地方旋起旋灭的革命实践不同,安源的工人运动持续的时间长,斗争的阶段特征明显,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共早期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珍贵的“活化石”。

一是它是中共早期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政策的具体体现。它不但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最为成功的工人运动之一。当时的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会之一,而且它所开创的工会工作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工会工作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安源地区当时还被称为中共的“小莫斯科”,它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工会干部,还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罗章龙认为,“当时党的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南方是安源,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以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工会提供经费”<sup>[6]1060</sup>)。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安源工人俱乐部,中共启发了工人的阶级与革命意识,宣传了党的革命思想,展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总

结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经验,开创了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二是它是中共早期革命最早实现转型的地区之一。在中共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斗争策略在安源地区失败以后,安源地区的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愈加激烈,他们尽管遭到了遣散,但在回到他们的故乡以后,迅速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通过组建农会与农村纠察队,安源工人开始逐渐在乡村地区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始探索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以赢得革命的胜利。他们在农村取得很大胜利以后,积累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提供了重要基础,还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源是中共顺利完成革命方式转型的地区与发祥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力量实行革命指导思想转变的有力的实践者。

## 二、从安源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看中共早期对革命实现途径的探索经验

安源工人运动一直是在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它的斗争实践是中共中央决策在地方基层贯彻的体现,因而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共早期革命的一个缩影。安源工人运动前后将近十年,并先后完成了从和平斗争到武装起义、从城市工人运动到乡村农民革命的两大转型,对我们以历史的长时段视野分析中共早期关于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启示意义。

(一) 从和平斗争到武装革命——中共早期对革命实现手段认识上的飞跃

近代中国人民为完成民族解放,曾经进行了无数次尝试,这中间既有诸如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改良运动,也有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旧式农民运动,也包括由近代政党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等,但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失败,中国的根本困境依然没有解除。对近代中国人民而言,争取民族自决、摆脱封建压迫是整个20世纪前半期的基本需要,而这种目的达到,由于国内外敌人的异常强大与反动,通过历史证明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方能达到,这在中共早期的革命

实践中也能得到证明。中共成立早期,由于全国党员数只有五十多名,缺乏武装,因而领导工人运动当成中心工作,但同时党也“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此时还是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只应搞发动群众的活动,不应该作军事斗争”<sup>[10]29</sup>,因而组织工会与教育工人是当时党的工作重点。为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除于1921年9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外,还规定了党对工人运动工作的具体指导方针:一是要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要求“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二是为提高工人觉悟,党还应大力创办工人学校,“工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组织工会的必要”。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则从19个方面提出了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其中第4条规定“工会应该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sup>[7]4</sup>。可见,中共成立早期的工作中心主要以发动罢工,改善工人生活,推进劳动立法等经济目的为重点,基本上是一种非军事的和平斗争,但二七等工人运动的失败,说明了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也揭示了这一点。

客观上来说,安源工人运动的前期是一种较高水平的工会斗争形式,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杰出的领导下,安源工人开创了一条富有地方特色的工会工作之路,劳资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为全国之最。比如在1923年间,俱乐部多次阻止工人的激进的进攻要求,而工人又很不理解,甚至还导致了工人对俱乐部的误解,“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发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刘少奇)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sup>[7]692</sup>。尽管如此,俱乐部还是冲破阻力,力促与当局合作,规定“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聚众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sup>[5]135</sup>。俱乐部充分表达了与矿局合作的意愿,然而安源工人运动还是被当局以残忍的手段加以镇压,导致这个结局出现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如汉冶萍公

司针对安源工人俱乐部就曾多次表达了镇压的决心,不但认为矿局1922年9月与工人签订的13条“多属迁就,实属窒碍难行,于公司损害极大,本会断难承认,应责成该矿长等设法收回”<sup>[6]1292</sup>,而且在多个场合中表达了武力驱除工人俱乐部的想法。如1923年5月公司董事会会长孙宝琦就曾致函江西都督蔡成勋,请求其“下令饬赣西镇守使督饬营县,迅速将工人俱乐部设法取消”<sup>[6]1396</sup>。同时安源工人运动的失利,还与日本的怂恿有直接关系,日本“今年(1925年)以来,一方面表示不肯继续贷借,一方面替三公司筹划如何压服工人。压服工人的唯一手段是停工。此事在大冶汉阳均已多次做到。唯安源方面因工人组织较强,不敢贸然执行,但实际无日不在处心积虑中”<sup>[5]541</sup>。劳资矛盾及利益冲突的加剧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图谋终于导致了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的发生。安源工人运动的和平斗争的失败,说明了“在这黑暗恐怖的社会里,资本家与工人利益始终是冲突的,绝无调和之余地;就是有了工人的利益,就没有资本家的利益”<sup>[5]532</sup>,同时也说明了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缺乏通过工会斗争、议会斗争的实行环境,因而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国的必由之路。正是安源工人受挫以后,党的领导人逐渐对于和平斗争工作进行了质疑,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如李维汉当时就指出“在没有得到整个的最后的政治胜利之前,一切和平的建设事业,都保持不住。这件事的教训不限于安源,全国被压迫民众都应认识其意义”<sup>[6]915</sup>。从此以后,中共开始把武装斗争作为实现革命胜利的主要武器,不但参加了国共共同领导的大革命的斗争,而且以后又单独发动了三大武装起义,武装革命成为了中共首选的革命实现方式。

(二)从城市工人斗争到农村工农革命——中共对革命实现方式认识上的飞跃

中共早期的革命带有鲜明的俄国十月工人革命的印记。由于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多为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俄国十月工人运动胜利的鼓舞与启示,以及对五四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开始将工人阶级纳入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认为“我们不欲革命而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sup>[1]42</sup>。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又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一大纲领是共产

国际代表协助起草的”<sup>[10]7</sup>,因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在成立不久的中共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即“他们这些早期的共产党员这时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考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sup>[12]274</sup>。为了能够达到如十月革命的梦幻般的美妙的结局,中共成立早期一直把城市工作的工人工作作为中心,高度赞扬产业工人的革命热情与实力,他们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因为产业还未发达,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在数量上看,实在是四万万全人口中的少数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sup>[11]42</sup>,因而“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sup>[11]42</sup>。正是基于对工人阶级的高度期盼,中共成立早期领导发动了多次的工人运动的高潮,但结果均多以失败而结束。工人运动的连连受挫开始促使党的领导人对于城市工人斗争工作的再认识,特别是开始对农村及农民的革命力量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我们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sup>[11]132</sup>毛泽东后来也认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sup>[13]139</sup>。正是中共在工人运动接连失败的现实面前,党的领导人开始将革命中心从城市转入农村,从工人运动转入乡村农民革命,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中共将革命实现空间从城市转入农村,这既是主观上的理论抉择,更是客观现实的逼迫,而实现了这种转换以后,中国的革命道路开始走向了新的发展轨迹,安源工人运动就是这种转型的重要表现。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以安源煤矿这个近乎城市类型的地域开展起来的,早期革命之路是以工人工作为中心的,对附近农村的农民工作不太关注,如刘少奇后来总结说“安源罢

工是成功的,出了不少干部,不过与农民运动结合得不够,这是缺点”<sup>[6]894</sup>。由于忽视农民工作,不但导致了工人在面对敌人时的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甚至还导致了工人与附近农民的对抗,如在九月惨案后就出现了附近农民在地主的唆使下去围攻安源的工人的事件。但随着安源工人的大批被遣散回到湘赣两省的农村后,他们开始与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开创了两地的革命的新局面,比如在湖南地区,“安源工人在湖南革命斗争中非常重要,不仅在工人阶级本身上说,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也是安源工人做起来的,远的岳北农民暴动,近农村斗争,最发展的醴陵与挨近的萍乡,都是很多安源工人在那里的影响”<sup>[5]894</sup>。安源工人运动转移至农村以后,在湘赣两省工农群众的共同推动下,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革命的形势日益高涨,成为中共领导的富有活力的革命中心之一。大革命时期,该地的工农群众还帮助国民党成立地方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又参与了秋收起义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认为“可以说秋爆颇具特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sup>[5]657</sup>;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们又追随毛泽东同志,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安源工人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的转型说明了近代中国由于是一个农民占人口主要部分的农业大国,因而中国的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三、结 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革命面貌出现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中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一个直线形的发展道路,而是一个历经了种种挫折与磨难的艰难的探索过程,这在中共早期的关于革命道路选择的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中共成立以后,曾力图照搬苏俄模式,以城市工人运动为革命中心,为此他们发动了多次的城市工人罢工,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工会斗争实践,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的革命道路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工人运动不断受挫以后,中共开始将乡村革命作为

革命胜利的依靠,中共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逐渐过渡为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共开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安源工人运动作为中共早期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近十年的革命历程中,完整地见证了中共早期对革命道路选择的全过程,它从早期的和平的工人运动逐渐转变为后期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斗争重心的成功转换,既是中共早期重要决策部署的体现,更是一种亲身经历的一种地方实践。它的革命道路的转换与抉择,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产物,还不如说是一种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既体现了地方革命的经验结晶,也诠释了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 [1]任建树.陈独秀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5]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6]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7]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8]萍乡市志编纂委员会.萍乡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 [9]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J].中央政治通讯,1927(12).
- [10]何沁.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11]邓仲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2][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Research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hieving Revolutionary Success in the Early Times

LU Hua-d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nyuan labor movement is a very successful workers'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which was led by Mao Zedong, Liu Shaoqi and Li Lisan and other older gener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 Unlike other worker movements in the same period in China, it lasted nearly ten years, and it witnessed a complet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 It also transformed from the workers movement to the peasants revolution, from the peace struggle to the violent revolution. It has a valuable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earl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has a "living fossils" value. Anyuan labor movemen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ts history has proved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w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process which gradually combines Marxism with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gradually go to mature.

**Key words:** Anyuan worker move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volutionary ways

[责任编辑 王 春]